

ZOU CHU HUN DUN

● 张福三 著

民族文学的文化思考

走出混沌

● 云南民族出版社



目 录

(1) 绪论 走向世界的民族文学

揭开神秘的面纱·多元素的综合、多层次的重叠·多种功能多种价值·建立民族文学的整体性意识·要有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

(30) 原始神话的农业经济色彩

植根于原始农业沃土里的神话·两种开天辟地·洪水神话中的农耕意识·大地——孕育万物的母亲·不同凡响的地域文化色块

(51) 从神话看各民族原始的宇宙观

太初宇宙混沌说·宇宙演化的几种方式·宇宙总体结构的基本模式·宇宙观形成的现实基础·宗教意义大于宇宙学意义

(69) 神话中的灵性、神性和人性

不自觉的艺术·世界似乎是有灵性的·最初神性的产生·神性的对立物——人性·有神性越大，非人性越大·悲剧神话的诞生

(82) 原始神话形象的特征及其意义

神话形象的物态化·主客体的混淆、幻想和现实的等同与颠倒

· 神话形象的象征性 · 形象和观念的直接统一 · 氏族 (部落) 的自识性

(97) 神话形象发展的三种形态

形形色色的神话形象 · 神话形象与象形文字, 手势语之比较 · 权威性的标志 · 怪异多样与匀称协调 · 形象的符号化与观念的浓缩

(111) 天梯神话的象征

从社会变革去看天梯神话 · 从宗教改革去看天梯神话 · 从婚姻形态去看天梯神话

(125) 兄妹婚神话的四个文化层次

阴阳观念的神话阶段 · 两合氏族群婚形态 · 人性上的善恶观念 · 民族传统上的大团结意识

(137) 原始人类对生命意识的反思

具有普遍意义的“死亡—复活再生信仰” · 个体复活和群体复活 · 肉体复活和精神复活 · 复活神话中的二重心理

(154) “拔牙”神话的原始文化内涵

人类的自我伤残行为 · “凿齿” = 拔牙 · 青春期拔牙 · 拔牙与民族识别 · 拔牙与成丁入社 · 拔牙习俗的后期衍变

(169) 原始工匠神形象的浮沉

原始社会的三大支柱 · 在开天辟地中大显身手 · 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 · 初显人类的自信心 · 赫淮斯托斯为什么是瘸子

(184) 南诏文化的特征

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鲜明的仿唐性·开放与吸收·多元与多源·十字路口的文化

(209)本主崇拜及其传说的人间性和世俗化

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不以族别论英雄、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出身论英雄·充满生活气息的本主世界·村寨文化的组成部分

(237)丰富多彩的贝叶文化

超越时空·结束结绳纪事的时代·优美的“绿叶信”传说·宗教经典与知识的总汇

(246)天真的儿童与儿童的天真

民间童话的特殊使命·讲和听的艺术·深刻的哲理和简明生动的形象

(262)民族史诗与叙事诗之比较

第一个成熟的果实·史诗的庄严性和客观性·叙事诗的生活化、戏剧化和性格化

(267)《西南彝志》中的英雄史诗成分

独特的彝文典籍·频繁的掠夺战争·英雄人物的双重人格·幼芽为什么没长成大树

(282)“涿鹿之战”与史诗

中国有没有民族史诗·苗族史诗的新发现

(292)外在美与内在美的统一

“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审美特点：鲜明性与单纯性

(302)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研究两题

叙事长诗中的爱情题材·傣族叙事长诗中的妇女形象

(316)白族民歌中的几种独特样式

串枝连·禽言诗和物喻诗·反义歌和打趣诗·谐音调及其它

(326)大本曲曲目初探

“三斋不抵一曲”与“高台教化”·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本·
曲目来源

(336)附录:

比较文学在云南

努力揭示白族文学的发展规律

楚雄彝族民间文学评述

(384)后记

绪论 走向世界的民族文学

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是一块美丽而神奇的地方，它是那么迷人，那么令人神往。可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它长期地受到冷落和忽视。它虽然很早就出现在祖国一些古老的文献典籍上，但由于记录过于笼统、简古、含混，使人们对它的过去知道得很少很少。在一些有偏见的人的记载里往往把云南描写成“蛮烟瘴雨”、“不毛之地”，甚至竟说这里的少数民族“人有尾”、“头会飞”等等。云南就像这里的横断山脉一样，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常常被一层神秘的云雾所笼罩，不识庐山真面目。可是有时当人们来到它的身旁，偶尔拾起一颗牙齿、几粒炭化稻粒、几件石器、一块陶片、几件青铜器，以及看到几个奇特的象形文字，便产生惊世骇俗的世界性的影响，使人感叹不已。比如一百七十万年前元谋人及其文化的发现，说明我国西南地区是古人类的家乡，是我国人类及其原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近几年这里又有新的突破。在元谋人生活的同一地区又发现了距今二百五十万年的东方人及其文化；继而又发现了四百万年前的“蝴蝶人”及其文化。“东方人”和“蝴蝶人”遗址相距不过两公里。它们已被考古学家科学地确定为人类最古老的祖先。这些发现不仅给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而且把人类历史提前约一百万年，从而使世界上古人类学家提出的“人类历史可能超过四百万年”的预言

在我们祖国的云南被证实了。

这些举世瞩目的偶然发现，极大地激发起人们的探索欲望，吸引了许多中外学者以及一些有识之士到这里进行发掘和研究，并取得很大的成绩。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较早系统了解、介绍云南的恐怕要数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据说他只到了当时云南的边沿地带）。他《史记》里的《西南夷传》就是叙述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历史状况、地理位置、部落分布、生产生活习俗等的专篇，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史记》里记的以滇池为中心的滇王事略，已为解放后发掘出来的晋宁石寨山滇文化所印证。北魏酈道元为《水经》作注，涉及到云南境内的一些山川河道和与此有关的历史、人物、物产、民族以及神话传说等。可惜的是酈道元生活在北方，并未来云南实地考察，只引证于古籍。晋人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是一部有关西南地区的历史专著，也可以说是一部最早的地方志。因常璩是蜀人，比起内地人来说得之于地利，加上他撰写此书时不仅广采博收前人记述，而且加进了自己实地考察得来的亲见实闻，因而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前人。唐宋以来有关云南的正史、野史、杂著就多了起来，对云南社会的各方面的了解，记录更加深入和全面，尤其是元、明、清三代关于云南除正史之外，各种别史、野史、地方志书尤如雨后春笋般地被撰写出来。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多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无法比拟的。

它们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1）这些内容驳杂的著作大都出自云南各地的知识分子之手，改变了外地人写云南的状况，而且覆盖面相当广泛，它几乎涉及到云南各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2）在唐以前的有关云南的著述中，大都是以记录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沿革、风土人情为主，对各民族的古老文学记载甚少。偶有记录也只不过是少量

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元明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开始注意各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风格各异的书面文学和口传文学，并把它们大量吸收进自己的著作中。《南诏野史》、《白国因由》、《掷珠记》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3）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学者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去实地观察云南各地的情况，写出各种旅行记。他们这种注重实地考察的行为不仅为我们研究云南各民族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也为我们对民族文学进行田野考察树立了榜样。其中著名的有元人郭松年和他撰写的《大理行记》、元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记》、明朝杨慎的《滇程记》、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清人余庆远的《维西闻见录》等。比如《大理行记》里写道：“故大理之民，数百年之间五姓守固。值唐末五季衰乱之世，尝与中国抗衡。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昏丧祭之礼，干戈战陈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寥寥数语，通过自己实地观察，不仅注意和写出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的特点，更注意和写出它与中原政治文化的密切联系。

从我们上面所作的一点简略的回顾中发现，人们对云南的历史、文学的了解和认识在逐步走向全面和深入，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在许多方面仍然停留在表层上，大多是情况的考察、采集，古籍的疏正整理，如果说这也是一种研究的话，它主要还属于描写研究。能称得上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深层研究，却还是发生于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这时祖国北方广袤的土地沦于敌手，许多高等学府南迁，各类学者、科学家云集滇境。这不仅给云南带来大批人才和知识，也输进了科学研究的

新观念和新方法。1938年底至1940年6月，考古学家吴金鼎率考古队对大理苍山洱海地区进行了考古发掘，第一次揭开新石器时代云南帷幕之一角。1938年底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深入云南禄丰县大北厂村作社会调查，写出他早年的社会学著作《禄村农田》。著名的诗人学者闻一多，以他深厚的中西文化的素养，把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与我国传统的方法结合起来，对西南地区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民情风俗以及少数民族一些独特的文化现象进行综合的深层研究，取得开创性的成果，对云南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个时期，历史学家方国瑜、江应梁等非常重视民族历史以及有关方面的田野考察。他们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我国民族史的创立做出了贡献。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还发现大量用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文献典籍，如纳西族东巴经师东巴用象形文字写下的东巴经。清人余庆远在他的《维西闻见录》里就提到：“么些有字迹，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以为书契。”但对它进行科学研究还是这个时期的一些语言文字学家如傅懋勣、李霖灿等。用彝文写下的彝文经典也大量发现，地质学家丁文江曾翻译出版了他的《爨文丛刻》；用傣文撰写的《勐史》也在这个时期译成汉文，1947年出版。这些卷帙浩繁的民族文字的经典极其丰富，里面除记录了大量有关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史诗之外，内容涉及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是各民族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知识总汇，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人们称它们是各民族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西南联大的师生还深入西南各地采风，搜集到大量的民间口传文学作品，以及有关民俗、民族学材料，使人大开眼界。诗人光未然就在1944年搜集、整理出版了彝族支系阿细人的史诗《阿细的先基》。徐嘉瑞

写的一部关于云南滇西地区古代文化的专著也于解放前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的文化研究相当活跃，成绩也是卓越的，有它的历史功绩。然而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情况相比较，无论是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开展，也推动了文化建设，对云南各民族的文化进一步进行了开发、认识和研究。许多震惊世界的考古文化大发现，都是出现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云南虽然还有许多奥秘在等待我们去进一步探索、研究，但它已不再是神秘的了。云南终于露出它的真实面目。这里有着极其丰厚的原始物质文化堆积，有着极其丰富的原始精神文化的遗留。云南是古老的，又是年青的；是富饶的，又是贫脊的；是美丽的，又是质朴的；是复杂的，又是单纯的；它是各种文化因素的复合体，又具有惊人的历史文化的两重性。在动植物学家看来，它是动植物的王国；在历史学家的眼里，它又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在人类学家的心目中，它是一座人类社会的博物馆；在我们搞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人看来，它又是神话、诗歌的海洋！就拿少数民族文学来说，在解放后近四十年里，全省对它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搜集到几千万字的文学资料，极大地改变着人们对民族文学的偏见。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学以它惊人的丰富性、原始性、生动性以及形态的多样性令人叹为观止。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被创造出来，民族文学理论队伍已经形成，这一切都使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开发和研究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一）增强民族团结，加强民族文学交流，提高各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文化，走在世界民

族之林的前列，然而在近代我们民族却落伍了。民族文化以及其它方面发展非常缓慢，被一些后进的民族所赶上或超过。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期的闭关锁国带来的狭隘的保守的民族心理。什么都是以我为中心，什么都是“老子天下第一”。这种自我隔绝的封闭行为，以及为保持民族文化的所谓纯洁性为而产生的排外主义，给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鲁迅在《准风月谈·由聋而哑》里这样写道：勃兰兑斯叹丹麦文学的衰微时，曾经说：文学的创作，几乎完全死灭了。……加以对于获得外国的精神生活的事现在几乎绝对的不加顾及。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也就招致了“哑”来。“由于各种因素促成的与世隔绝和自我封闭所导致的民族文学的孤立、停滞、枯萎、退化乃至消亡”^① 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不乏其例的。这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看得更加清楚和深刻了。学习、吸收、引进、借鉴外来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优秀的文化来发展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新的民族文化是显得多么必要了。但是这又在一部分人中间产生了一种急躁情绪。他们把中国近代的落后，完全归之于民族的传统文化，他们抓住民族传统文化中确乎存在着许多腐朽的、落后的、保守的观念和传统，对民族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加以全盘否定，他们把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对立起来。他们为了轻装走得快一点，急于甩掉身上传统文化的因袭的重担，斩断自己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去创造一种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所谓的世界文学。传统文化是割不断的，尤如一条奔腾向前的长河一样也是割不断的。要深刻了解一个民族的今天，发展它的明天，就必须深入研究它的昨天。

^①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25页。

尤其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它是这个民族几千年来集体意识和智慧的积淀。无论是它的外显性和内隐性都在这个民族的现实生活中发生作用，对这个民族的性格、心理、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有强烈的稳定性和排他性。一些外来的观念、文化如果不能与这个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相结合，它很难在这个民族的文化土壤里扎根。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证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总是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的交融中发展的。只不过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来说，这个交融过程是曲折的，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对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学采取否定的态度，一般说来是出于无知和偏见。解放后，虽然我们搜集、整理和出版了大量传统的民族文学作品，但在一些人心里可能还是一个空白。或者出于传统的偏见，在他们的眼里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学是属于低层次的文学，不能登大雅之堂。他们所谓的中国传统民族文学只是汉民族的文学。这种历史的偏见在许多人身上还是存在的。比如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中国有无史诗和中国神话的系统性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无知和偏见产生的。中国没有民族史诗这个论断最先是由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来的，而且对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产生像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这样规模宏大的民族史诗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这以后人们大都沿袭黑格尔的说法。如果仅以我国汉民族的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他的这一看法无疑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之外，这里还生活着五十多个民族，他们以自己的智慧为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繁荣昌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果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发展史，不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史那是不正确的。要谈史诗，不把少数民族的史诗包括在内，这也是不正确的。从目前我们发掘的情况

来看，在我国少数民族那里不仅有规模宏大的，与希腊、印度史诗相比毫不逊色的许多英雄史诗，而且还有内容独特的创世史诗（有人称之为原始性史诗或神话史诗）和民族迁徙史诗。我国北方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都是长篇巨制，有很高的价值。《格萨尔王传》有一百多万行，长度堪称世界史诗之冠。就以我们云南来看，英雄史诗也不少。在傣族就有五大诗王之说：《吾沙麻罗》、《粘巴西顿》、《兰嘎西贺》、《占响》和《巴塔麻戛捧尚罗》。为什么把这五部诗歌称为诗歌之王呢？傣族古典诗歌理论《论傣族诗歌》的作者是这样解释的：“最大最长的是《吾沙麻罗》，这是五中之大王，是大哥，我没有数过它究竟有多少行数的缅纸，如把它单句单句的排列，不会少于十万行。我读时，坐下来手抬不动，只得把它放在经书盘上，称了称，共有八斤三两，相当于我们傣族的四包红糖那么重。”显然，诗王是以诗的长度作标准的。这五大诗王之中，《粘巴西顿》、《兰嘎西贺》、《占响》是属于英雄史诗，而《巴塔麻戛捧尚罗》则是一部属于叙述开天辟地、人类及万物形成以及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演变过程的创世史诗。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诗如羌族的《羌戈大战》、彝族的《支格阿龙》、《嘎玛阿妞》、《铜鼓王》；纳西族的《黑白战争》、《哈斯战争》；傣族的《相勐》、《厘棒》、《阿暖和他的弓箭》等。创世史诗著名的有彝族的《梅葛》、《阿细的先基》、《查姆》、《勒俄特依》、《古侯》；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打歌《创世纪》；苗族的《古歌》；拉祜族的《牡帕密帕》等等。仅就上面所列举的这些诗篇来看，中国不仅有民族史诗，而且数量很多，内容丰富多彩，是我们认识中华民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珍贵材料。至

于我国神话，保留在汉族的文献典籍里的确很少，而且经过窜改（比如神话历史化就是其中原因之一），显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系，而且大都失去它的原始性。然而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到少数民族那里，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我国古代的许多神话，大量的保留在少数民族的口头上和用民族文字写的宗教经典里。数量不仅多得惊人，而且很少受到外界的干扰；保留了很大程度上的原始性，具有丰富的科学价值。近几年来云南掀起了一股不小的神话研究热，在神话的理论研究上有较大的突破，它就是建立在对少数民族神话的大量发掘的基础之上的。

云南各少数民族那里还蕴藏着数量惊人的长篇叙事诗。从五十年代以来我省出版的各民族的叙事长诗就达三十来部，其中彝族的《阿诗玛》、傣族的《召树屯》、《娥并与桑洛》、《葫芦信》等在国内都有很大的影响。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类型的叙事长诗和抒情诗，仅以傣族为例，号称有五百部之数。目前已发掘出来的有二百一十多部。这对一个少数民族来说，这个数字已够惊人的了。而在汉族文学史上可称得上民间叙事长诗的那是屈指可数的。当然近几年来在汉族民间也发掘出一些叙事长诗。如长篇叙事吴歌《五姑娘》、《六郎娶小姨》等。至于我省各民族的传说故事，童话寓言以及各种民间歌谣等，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数量应以千万计。与民间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各类民情风俗、宗教信仰、民族历史等背景材料，更具有它不可估量的科学价值。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比如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生产力低下，社会发展不平衡，比起内地先进民族来说，在许多方面是落后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少数民族什么都是落后的。比如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就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汉族的民间文学的历史还要长，内容

还要丰富。它们极大的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学，是它宝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给少数民族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充分的评价。正如斯大林所说：“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它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①因而我们认为对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开发、整理和研究，对增强民族团结，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学交流，提高各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是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建立民族文学整体性意识

过去，我们在对民族文学进行研究的时候，总是把它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只能局部地、孤立地去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现象作静态的考察和研究，而且形成了一套束缚人思想的僵化的研究模式。这种研究虽然也可能取得某些成绩，产生一时的效果，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封闭的研究不可能从本质上，从整体上去认识民族文学的各种特殊现象，不可能真正揭示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且这种研究视界窄小，毫无生气，把本来充满活力的，有着有机联系的文学体系和对象变成僵死的东西，这阻碍着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我们应该打破这种封闭狭隘的小天地，把某一民族的文学，某一文化现象，某一作品放到更宽阔的背景上，更广泛的联系中，从历史发展的高度，从民族与民族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上去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和考察，树立民族文学整体性意识，以求得符合实际的结论。事实上，世界上也没有绝对孤立和完全封闭的民族，他们

^①《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377页。

或多或少，或速或缓地和世界其他民族发生联系。如果有，带给他的只是衰亡。大量考古发掘业已证明，就是生活在数万以前的原始氏族部落群体，他们经常处于流动之中，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或迫于战争，他们南来北往不断在我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迁徙，经历了无数沧桑变化。这些氏族部落就在这频繁的迁徙流动、共处中不断融合形成新的氏族部落以及更后来出现的民族。他们的文化也在这交流、融合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乃至杂交为新的民族文化。当然这种民族文化的交流，有内部交流和外部交流之分，有高层次的交流和低层的交流之别，但民族和民族文化的交流是始终存在的。这是民族文化不断发展，万古常新的基本动力之一。正因为如此才逐渐形成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堆积，要想在今天民族的血管里和文化堆积里找出一个民族纯而又纯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从云南来说，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境内山势险峻，丛峦叠嶂，使一些地区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这严重的阻碍一些民族与外界的交流，民族和民族文化发展缓慢，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这种局限性和保守性，我们应该予以充分估计，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完全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在那里自生自灭。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云南各个民族支系之间有文化交流，不同民族之间也有文化交流；云南民族同西南地区其他民族有文化交流，与祖国的东方、北方、南方和中原民族也有广泛的文化交流，它是中华民族文化整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原始人心目中的世界》一书的绪论里写道：“河流不仅是人类文化诞生的摇篮，也是原始人类进行迁徙、文化交流、传播的主要通道。因此，云南地区依靠长江与它的中、下游地区文化有着密切联系；依

靠金沙江、澜沧江、大渡河，又与我国西北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密切联系。即是说，西南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着我国两河流域（长江和黄河）的原始文化的因素。大量的考古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①这一段话是仅就国内而言的。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不难发现，通过红河水系，与越南发生联系；通过澜沧江水系与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发生联系；通过怒江水系与缅甸、泰国发生联系；通过伊洛瓦底江与缅甸发生联系。云南各民族不仅与接壤的国家和民族有文化交流，就是远隔千山万水的日本、印度以及欧洲的一些民族也有文化交流。

从陆路来说，云南的横断山脉，山高谷深，江水湍急，舟不可渡，对民族之间的交往带来困难，尤其是对生产力低的原始民族，这似乎是难以逾越的天堑，然而云南各民族的原始先民们，却以它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将它打通，开辟了我国南方陆上的最古老的一条丝绸之路。据专家考证这条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开通，比人们所熟知的我国北方的丝绸之路早两个世纪。而且这条古老的国际通道，是我国西南与西亚、非洲距离最短的陆上交通线，而马帮、栈道和笮桥（用竹蔑拧成一根粗大的绳索，系于河谷两岸，借助木制溜筒，依赖重力把人畜滑向对岸，俗称“溜索”）就是我们祖先征服天险的伟大创造，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这条丝绸之路大体走向是：始于四川省的成都，经邛都（西昌），渡金沙江至牂牁（今大理），出滇越（腾冲及东南），经伊洛瓦底江去缅甸，再到印度。这条鲜为内地人知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发现还有一个动

①《原始人心目中的世界》5页，由本人与傅光宇合著，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